

专题：中美关系迈向“新冷战”？

21世纪的中美角逐：冷战2.0版既视感

[美] 金骏远

内容提要：过去25年里跌宕起伏的中美关系，在2019年出现了明显而且可能是不可逆转的恶化。这种变化引发争论，即中美是否已经成为新冷战中的竞争对手，甚至是敌手。本文将检验使竞争不断加剧的五个潜在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反映了中美所处国际环境的关键特征（系统或结构制约），以及为何两个竞争对手恰好是中国和美国（国家或单元层面的属性）。国际上最主要的制约因素是无政府状态的结构条件和界定该体系极化的权力分配。与理解中美关系演变最相关的国家属性是两国核心利益交汇的地理区域，以及两国军事相关技术能力两个方面。检验这五种因素，可让我们注意到当前中美竞争与冷战时期的美苏竞争之间一些重要异同点的原因。可以明确的是，如果当前局势发展为第二次冷战，它将不会简单复制第一次冷战的竞争模式。不幸的是，本研究还注意到因中美竞争的特殊性带来的一些新的关切，以及未来几十年里这些问题可能带来的挑战。

关键词：冷战 中国 美国 两极 核威慑 无政府 网络攻击

在2019年，以过去25年跌宕起伏为特征的美中关系出现了明显且可能不可逆转的恶化。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美关系的特点是合作与有限竞争并存，但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两国关系日益紧张，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担任总统期间发生明显的决定性变化奠定了基础，这对两国

金骏远（Avery Goldstein）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原文刊载于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英文期刊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 2, No. 1, 2020, <https://doi.org/10.1007/s42533-020-00036-w>)。此处刊载已获得作者本人及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出版集团的授权许可。

关系构成了考验。在美国，一场被称为“接触政策”(engagement)的讨论兴起，很快演变成了一场关于中美是否已经成为新冷战中的对手，甚至是敌手的辩论。在学术会议和二轨对话上，以及期刊和报纸的版面上，美国观察人士迅速意识到，令人担忧的中美关系新形态与持续了40年的美苏对峙是何其相似。¹ 起初，中国的同行们不愿意接受冷战类比的有效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也开始参考美国同行的观点，并争论其优缺点。尽管每个人都承认2020年的世界与冷战时期的世界不同，也都承认中美之间的分歧与驱动美苏对立的分歧不同，但是冷战类比显示出一种强大的吸引力。²

为了进一步说明冷战类比的有效性与局限性，本文考察了塑造中美新竞争关系的关键因素。据此，这篇文章还揭示了从接触背景下的有限竞争，快速转变为一些人称之为“新冷战”的更公开的对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初现端倪的原因要素。如果不是因为美国要应对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这种脱离接触政策的过渡很可能发生在更早，并在2001年后以一种更加渐进的方式进行。当时，新上任的小布什政府原本计划将中美关系重新定义为战略竞争而不是伙伴关系，但是恐怖袭击转移了他的注意力。相反，小布什政府转而开始关注“全球反恐战争”的要求。因此，将近十年后，当美国结束其在阿富汗、伊拉克、中东和非洲其他地区的主要军事行动时，曾在“9·11”事件发生之前促使小布什政府考虑的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才重新浮现，而中国的财

1 相关观点见 Michael Lind, “Cold War II,” *National Review*, May 10, 2018,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magazine/2018/05/28/us-china-relations-cold-war-ii/>, 2020-06-10; Graham T. Allison, “The U.S. is Hunkering Down for a New Cold War with China,”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12,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666b0230-cd7b-11e8-8d0b-a6539b949662>, 2020-06-10; Robert D. Kaplan, “A New Cold War Has Begun,” *Foreign Policy*, January 7, 2019,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1/07/a-new-cold-war-has-begun/>, 2020-06-10; “A New Kind of Cold War,” *The Economist*, May 16, 2019,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9/05/16/a-new-kind-of-cold-war>, 2020-06-10; Hunter Marston, “The U.S.-China Cold War Is a Myth,”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6, 2019,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9/06/the-u-s-china-cold-war-is-a-myth/>, 2020-06-10; Charles Edel and Hal Brands, “The Real Origins of the U.S.-China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June 2, 2019,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6/02/the-real-origins-of-the-u-s-china-cold-war-big-think-communism/>, 2020-06-10; Walter Russell Mead, “Beijing Will Give You Cold War Nostalgia: Nuclear Deterrence Was Simple Compared with the Fluid Nature of Cyberwarfar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4, 2019, <https://www.wsj.com/articles/beijing-will-give-you-cold-war-nostalgia-11572909192>, 2020-06-10; Niall Ferguson, “The New Cold War? It’s with China, and It Has Already Begun,”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12/02/opinion/china-cold-war.html>, 2020-06-10; Melvyn P. Leffler, “China Isn’t the Soviet Union. Confusing the Two Is Dangerous,” *The Atlantic*, December 2, 2019,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19/12/cold-war-china-purely-optional/601969/>, 2020-06-10。

2 如果严谨地使用，这种类比法非常实用，解释可见 Yuen Foong Khong, “The U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Analogy,”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 1, No. 2, 2019, pp.223-237。关于历史类比的实用与局限，参见 Ernest R. May, “Lessons” of the Past: The Use and Misuse of Hist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Yuen Foong Khong, Analogies at War: Korea, Munich, Dien Bien Phu, and the Vietnam Decisions of 196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富和权力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发生巨大变化又放大了美国的担忧。奥巴马政府决定重新调整美国战略的优先次序，将重点放在亚太地区的挑战与机遇上，正是反映了这种担忧。¹ 亚太再平衡战略，俗称“转身亚太”(the pivot)，为中美在该地区的竞争升级做好了准备。特朗普任内这种竞争的加剧促使许多人思考，中美关系可能正处于“新冷战”或“第二次冷战”的早期阶段。

接下来，本文将检验导致中美竞争不断加剧的五个潜在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反映了中美所处国际环境的关键特征（系统性或结构性制约），以及为何两个竞争对手恰好是中国和美国（国家或单元层面的属性）。国际体系上的主要制约因素是无政府状态的结构条件和界定该体系极化的权力分配。与理解中美关系演变最相关的国家属性是两国核心利益交集的区域，以及两国军事相关技术能力的两个方面。对这五种影响的考察，将让我们注意到当前中美竞争与美苏冷战之间既有重要的相似之处，也有重要的不同之处。可以明确的是，如果当前正在出现第二次冷战，那么它将不会简单复制第一次冷战的竞争模式。不幸的是，本研究还注意到因中美竞争的特殊性带来的一些新的关切，以及未来几十年里这些问题可能带来的挑战。

如果当前正在出现第二次冷战，那么它将不会简单复制第一次冷战的竞争模式。

一、无政府状态：旧原因，新影响

无政府状态，意味着国家间缺乏能够可靠地解决争端的超国家权威，促使所有国家都需要认真思考为自己的安全提供保障的可能性。当上述安全忧虑加深，国家更倾向于担忧自身的弱点。这些弱点并不局限于他者可能造成的军事威胁，还包括经济相互依赖导致的脆弱性。尽管无政府状态造成的后果并不新鲜，但是与以往美苏关系相比，它对中美关系，尤其是中美经济关系的影响则是不同的。²

美苏两国对经济相互依赖所固有的相互脆弱性带来的安全问题表示担忧，因此自冷战开始双方都避免与对方进行过广过深的经贸往来。并且，两国分别建立了自己的经济集团，这些经济集团与各自的安全联盟网络保持了基本一致。相比之下，在冷战的最后几十年里，中美作为对抗苏联的战略伙伴，尤其是1978年

1 Hillary Rodham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Vol. 189, 2011, pp. 56-63.

2 笔者关注的是无政府状态带来的潜在安全威胁。另一些学者怀疑这种传统生存问题对于中美来说是否仍处于中心地位，他们更关注国际声望、地位或者权威的竞争，如 David A. Lake, “Domination, Authority, and the Forms of Chinese Power,”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0, No. 4, 2017, pp. 357-382。笔者并不否认这些其他的概念考虑（中美彼此竞争，试图塑造国际社会对它们应对 COVID-19 表现的认知，为此提供了证据），但相对物质实力仍处于中心位置，因为至少从短期来看，它为威慑力量提供支持，打出国际威望、地位和权威的口号都是应对核心利益威胁的途径。

中国领导人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中美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在接触政策的全盛期，中美关系以有限竞争为特征，双方都乐于关注经济交流带来的共同利益。用中方经常使用的一句话来说，这些往来带来了“互利共赢”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担心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问题，但此类问题似乎是遥不可及的，或者如果有必要的话，至少是以后才需要考虑的问题。之后双方也曾有意愿通过双边对话或多边经济机构，特别是世贸组织（WTO）来处理上述关切。但是一旦“竞争”生根发芽，两国的注意力就从“双赢”转向“谁赢的更多”。或者正如有关无政府状态后果的文献中常指出的，双方都开始关注密切经济联系带来的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¹ 尽管这些关切反映出国家共存的长期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状况，但从一国是否视对方为不确定的意图和能力可能构成威胁的竞争对手来看，上述关切的重要性不同。就中国和美国而言，将彼此视为竞争对手的转变，加剧了对脆弱性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双边谈判变得更加困难，而国际机制有效性的局限却更加突出。

随着竞争关系日趋激烈，美国担忧宽松的接触政策正让中国变得更加富强，培育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最终可能危及美国的安全。这种担忧在世纪之交时首次出现，当时促使美国国会在2000年成立了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但是，在中美关系发生转向前，上述机构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等其他政府工具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像冷战时期的多边出口控制协调委员会（CoCom）那样重要，后者严格限制西方国家与苏联阵营的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的成员往来。部分原因是，“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国家安全的焦点集中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而且大部分美国消费者正享受着与蓬勃发展的中国的经济联系带来的巨大好处，因此美国忽视了相互依赖加深带来的脆弱性问题。

然而，到20世纪10年代，美国开始重新关注亚太地区时，中国不仅成为了经济巨人，其军事实力和活跃度也与日俱增，美国对相互依赖风险的担忧进一步深化。美国更加认真地规范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相较于本世纪初的状态，美国的安全焦虑变得更加深重，并开始采取行动。² 然而，由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美国和其他国家已在全球供应链中彻底融合，针对这些新的担忧采取行动的难度和代价也巨大。在冷战时期，美国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就设定目标，要避免美苏经济秩序的连接（coupling），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近十年，减少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将导致被称为“脱钩”（decoupling）的现象。这种“脱钩”，要断开已有联系，必然是一场全新的、极具破坏性的过程，需要中美两国

1 关于经济相互依赖可能导致冲突的影响，参见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enlo Park, C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 1979, Chapter 7。

2 关于近期中美关系安全化（securitization）的论述，参见Evan S. Medeiros, “The Changing Fundamentals of US-China Relation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2, No. 3, 2019, pp. 93-119。

和全世界所有的经济伙伴都做出重大调整，冷战经验难以对此提供洞见。此外，因为双方都痛苦地意识到相互依赖所造成的诸多弱点，“脱钩”本身可能还会加剧无政府状态导致的安全焦虑。

上述的新安全焦虑已经在多个领域显现，美国正重新审视在这些日益扩大的领域里因中美密切往来所带来的遗留问题。从电信领域的新5G时代，到美国城市公共交通的铁路和公共汽车，美国对中国公司参与其基础设施升级中扮演的角色感到担忧，这反映出对经济相互依赖与国家安全之间的联系日益增长的不安。美国收紧签证政策与规定，限制中国学生和学者进入美国的教育机构和实验室，是竞争已经改变成本与收益计算方式的又一体现。过去曾被视为互惠互利的交流如今却被打上了问号，因为美国担心中国借此机会获取专业技能，从而增强其相对于美国的经济或军事实力。

中美“脱钩”必然是一场全新的、极具破坏性的过程，需要中美两国和全世界所有的经济伙伴都做出重大调整，冷战经验难以对此提供洞见。

美国的举措反过来也在中国引发了类似的担忧，中国也对几十年来经济依赖不断加深所致的自身脆弱性感到忧虑。尤其让中国担忧的是，中国下一阶段经济现代化愿景的核心——即技术先进部门，其关键投入仍依赖美国输入。据此，中国发起《中国制造2025》(MIC 2025)计划，旨在减少在关键零部件方面对美国的严重依赖。尽管随着政府补贴成为中美贸易谈判的争论焦点，“中国制造2025”的能见度有所下降，但是中国提高自主性的决心没有动摇。的确，随着美国限制甚至禁止中国的电信企业在美国市场的运营，并推动一场全球运动，以说服其盟友、合作伙伴和其他国家紧随其后，中国解决自主性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因此，尽管特朗普总统让中兴(ZTE)暂缓执行最初看起来会让它倒闭的禁令，但美国随后对华为(Huawei)的限制可能会削弱这家中国领先的国际科技公司的全球生存能力。不出所料，中国政府以增加对本土研发的投资，以增强自力更生能力作为回应。其目的不仅是确保华为这样的特定企业的持续生存能力，更是为了削弱美国作为商业和军用关键技术主要来源国的影响力。

对相互依赖的担忧正在管理中美投资者市场准入、保护敏感行业关键技术的新规则。旨在解决2018年以来关税引发的贸易战而举行的双边谈判，正是在这种担忧的笼罩下进行。第一阶段协议于2020年年初达成，成功缓解了紧张局势。但是，第一阶段谈判并没有在更加艰难的议题上得到推进，其中包括相互依赖引发的安全担忧，都被推迟到今后的谈判中。但是，基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结构性限制，谈判难以解决这些问题。即使取得进展，达成第二阶段协议，其意义尚不明确。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尽管正式的协议通常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不确定性、指导行动、塑造预期，但最终仍是一种自我执行的协议。即便是最精心制定的协议也无法消除对未来行动的疑虑，而且，因为中美现在都把对方视为对手，这种事关安全担忧的疑虑难以消除。

由于无政府状态导致的后果，中美之间已经开始的“脱钩”可能以某种形态继续下去。问题的关键是“脱钩”会进行到何种程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由于塑造经济决策的政治调控不如全面实行接触政策时期的那样重要，“脱钩”（即使是部分“脱钩”）也可能导致经济决策效率低下。“脱钩”的机会成本将包括放弃具有经济意义的供应链，以及放弃一些有助于科学进步的研发领域的国际合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严重混乱，充分说明了在无政府状态下中美对抗对全球化秩序可能产生的影响。然而，正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著名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论断中提到的例子，中美两国很可能都认为，为了保护自身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付出高昂的机会成本也是正当的。¹

二、从单极到两极：旧原因，旧影响

中美关系在过去20年里的演变，不仅是在无政府状态的阴影下展开的，还伴随着国际体系权力分配发生转移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中国开始加速崛起，开启了冷战后以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为标志的单极国际格局的转变。在21世纪前半叶，这种转变预示着世界向两极格局的方向演进，由于中美实力超群，区别于国际舞台上的其他国家，它们将构成一对特殊关系。需要指明的是，两极格局的形成并不取决于国际体系中两个遥遥领先的国家之间是否势均力敌，而是取决于它们与下一个最强大的国家集团之间是否存在巨大的实力差距。两极（或者多极）格局也不意味着构成大国实力的成分是对称的。例如，在冷战时期，苏联在许多方面逊色于美国，尤其在经济实力和先进军事武器质量方面。然而，基于它数量庞大的常规武器和核武库，尽管滞后但体量依然庞大的经济，加上纪律森严的政治领导，苏联总体实力对美国造成的威胁和竞争是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匹敌的。²

早在20世纪末，中国就已经成为可能终结冷战后美国单极时代的唯一可靠候选者。2001年秋季，在美国将注意力转向全球反恐战争之前，美国已经领悟到这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即将崛起，因此小布什政府最初计划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等到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重新将战略重心转向东亚，中国经济和军事崛起的重

¹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参见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1, 2019, pp. 42-79。

² 关于两极化的含义，包括其与世界分裂为两大意识形态阵营之间的差异，见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Øystein Tunsjø, *The Return of Bipolarity in World Politic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o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要性已毋容置疑。如果单极世界还没终结，其终结之势已经显而易见了。¹

研究冷战时期大国竞争后果的理论家们，尤其是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指出两极体系中的“双寡头”（duopolists）有强烈动机去密切监视对方，开展广泛竞争，以防另一方获得战略优势。在两极世界中，双方都知道，只有自身拥有全面的、能有效应对对方可能构成的威胁的能力。21世纪两极格局即将到来之际，中美开始以类似苏联和美国在20世纪的行为来回应自身的局限性。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中美竞争前所未有的激烈，并开始蔓延至东亚以外的地区。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其军事存在从非洲到北极不断扩张（即使依然有限），美国已经对此表示担忧。反过来，中国也批评美国针对中国影响力增强的言论和行动，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并承担与其日益增强的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却遭到美国危言耸听的无端指责，显然有失公允。围绕中国于2013年后提出的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展开的激烈争论，这种竞争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无政府秩序的体系中，两国的实力超群将它们与其他国家区分开来，这为两国提供了强烈动机，促使它们对各自的相对实力保持密切关注，并严密监控对方的国际行为，因为双方都明确地将对方视为最重要的潜在对手。但国际格局的束缚只能部分解释为何近来中美冲突不断扩大、加剧。同样重要的是，在国际格局的制约中走向竞争的两国恰好是美国和中国。

三、地缘：令人担忧的新影响

在无政府状态和两极格局的暗示下，中美担忧相互依赖导致共同弱点，它们密切关注着对方，关注的焦点也日益转向两国利益交汇的地理空间，即西太平洋

¹ 参见Øystein Tunsjø, *The Return of Bipolarity in World Politic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ostructural Realism*; Yan Xuetong, “Why a Bipolar World Is More Likely Than a Unipolar or Multipolar One,”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Vol. 32, No. 3, 2015, pp. 52-56。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计算方法必然存在争议。但是到20世纪10年代后期，中美在上述两个领域都遥遥领先。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以汇率为标准（而不是购买力平价，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计算部分国家的排名会上升）对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较为保守的估计，美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体量大约是美国的三分之二。尽管这意味着美国经济仍比中国经济大50%，但是考虑到其他国家和中国的差距，上述差异就相形见绌了。中国经济体量比下一梯队（德国和日本）的大三倍，比英国、印度、法国的大五倍。由于数据的保密性，估算军事实力尤其困难，而且分析表明，军事开支、武器当量和人员数量并不能准确反映真正的军事实力，还需要衡量部队、训练和经验的质量。不过，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对军事开支的估算具有参考价值。美国依然遥遥领先，军事开支是中国的2.5倍，中国的开支是下一梯队（沙特阿拉伯、印度、法国、俄罗斯）的近四倍，是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的五倍多。见Nan Tian, Aude Fleurant, Alexandra Kuimova, Pieter D. Wezeman, and Siemon T. Wezeman,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18,”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April 2019, <https://www.sipri.org/publications/2019/sipri-fact-sheets/trends-world-military-expenditure-2018>。

中美担忧相互依赖导致共同弱点，由于双方都认为在两国利益交汇的西太平洋海域拥有重大利益，这里成了中美竞争的主战场。

海域。由于双方都认为在该区域拥有重大利益，这里成了中美竞争的主战场，就像美苏竞争的主战场是欧洲大陆中部一样。然而，这些不同的地理环境表明，与欧洲作为冷战对峙的前沿不同的是，这是一场在亚洲海上展开的对峙，这种差异引起了特别关注。

首先，双方在太平洋地区已有核心利益之间的界限并不分明，彼此都明白一旦挑战所谓核心利益，就可能会引发灾难性战争。在冷战时期的欧洲，沿着二战结束后的占领军阵线，美国和苏联的核心利益很快得到确立，明确划分出各自的盟友。随后发生的事件（三次柏林危机，苏联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美国仅表示道德同情而无实质支援）巩固了对试图挑战欧洲现状的危险的共同认识。相比之下，中美在西太平洋核心利益的地理划分并不清晰，而且当前中美两国尚未经历冷战时期地理划分所带来的危险而发人深省的经历。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台湾海峡双方都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利益，其功能似乎可媲美东西德之间的中央战线。然而，如果新一轮挑战现状的危机被触发，中美两方的分析家至今仍无法就双方将如何做出反应达成一致。上述不确定性增加了双方或其中一方误判对方反应的风险。在西太平洋的其他地方，中美核心利益的界定更加模糊，针对东海海空两域和中国南海，双方仍在不断亮明立场，试探对方是否坚定。简而言之，与冷战时期欧洲的主战场不同，在西太平洋地区，很难划定会导致双方开战的核心利益的“红线”。

其次，中美以海洋为主要竞争场域将造成新的危险。与（在冷战时期的欧洲）陆上固定的军事对峙不同，即使双方（在西太平洋）的海上力量没有直接发生冲突，只要在有对方军事势力存在的海域，他们也会进行巡逻、机动、演习。持续不断地监视、追踪、跟踪、警告和其他海上行为，使得双方姿态逐渐制度化，培养出一种敌对的心理。军事行动混合交织在一起也增加了摩擦的可能性，小摩擦可能演变为危机，并有可能升级为更大的军事冲突。事实上，美国海军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及其他海上力量）之间已经发生过此类事件。更令人不安的是，尽管双方努力建立正式的“交通规则”来预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此类事件仍在继续发生。¹

¹ Bonnie Glaser and Jeff W. Benson, “Conflict Preven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epends on China Abiding by The Existing Rules of Navigati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27, 2020, <https://amp.scmp.com/comment/opinion/article/3052429/conflict-prevention-south-china-sea-depends-china-abiding-existing>, 2020-06-10.

四、核武器：老故事，旧影响

无政府状态的两极世界背景下，中美同作为核武器国家，是影响中美竞争关系的另一个因素。鉴于美苏冷战的经验教训，核能力的影响在如今的这场较量中既令人放心又令人不安：令人放心是因为核威慑的战略逻辑，令人不安则是因为核态势反映的不仅仅是战略逻辑。

战略逻辑和美苏四十余年的冷战经历，以及其他较小型核武器国家的经验表明，拥有可交付使用的核武器会使人们更加谨慎，在战争危险临近的时候，这种谨慎会变得更加强烈。由于恐惧战争迅速导致灾难性后果，压倒了对那些声称能勾勒出通往有意义胜利之路的计划采取行动的诱惑。即使是在极少数情形下，拥核国家处在危机和小规模有限冲突中，双方都表现得小心谨慎，全神贯注地避免局势升级为常规战争，因为是否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决定权可能不在自己而是对方手里。¹ 无论竞争如何激烈，中国和美国都拥有对方都无法确保摧毁的核武器，而且常规防御无法消除核武器造成的灾难性破坏，这极大地降低了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

不幸的是，尽管从逻辑上讲，只需用对方无法接受的打击报复来威胁对方，就足以形成威慑，但是有时候，拥核国关注的是给予惩罚性报复的相对能力，而不是绝对能力。美苏冷战时期，有大量证据表明，双方为了在核能力上势均力敌，争相建立更大的核武库，从而引发军备竞赛。为何国家要进行战略上无益、经济上代价昂贵的核军备竞赛呢？简单来看，是因为威慑的简单战略逻辑仅是影响国家核力量部署决策的因素之一。根据冷战史的启示，有三方面理由担忧中美在新时期可能出现核军备竞赛。

第一，在两极世界中，两个领先大国都将注意力放在未来最主要军事对手的能力和意图上，夸大的恐惧（或希望）导致两国认为相对优势可能会变得重要，促使它们做好对冲风险的准备，因为现实世界的冲突对峙可能并不符合战略理论家们的预测。此外，面对上述担忧，超级大国有能力整合大量资源，实力允许它们对一些不太可能发生但又可以想象其发生的场景采取防范行动。在冷战时期，对于可能性极小的事件以及拜占庭式的战争场景的想象，促使美苏大量扩充远超过威慑战略需求的核武库，在这些想象的场景中，核武器并不仅仅用于以惩罚性报复行为来威胁对方。

第二，当单一对手成为一国国际地位的主要参照物，进行不公平的比较，由

¹ Avery Goldstein,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China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 in Michael D. Gordin and G. John Ikenberry, *The Age of Hiroshim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221-242.

此引发的政策辩论促使国家出于战略怀疑而进行军备扩张。在冷战时期，过度关注两个超级大国核武库的相对当量和精密程度曾引发担忧，在核实力方面一方的已知优势可能会影响到双方在全球影响力方面的竞赛。1957年，当苏联率先展示出通过洲际导弹运送核弹头的可能性时，毛泽东对此评价为“东风压倒西风”；尼克松政府的“核充足论”也关注相对核能力的政治意义，¹二者都体现了上述思维。

第三，以唯一的对手作为标杆，国内政治参与者就更容易辩论军备是否充足，他们利用对核弹头、运载工具的不公平比较，以实现他们的狭隘目的。陆海空三军、武器制造商和政客都有动机渲染对手核优势可能带来的严重风险。如此，他们便可以把从爱国情感出发的利益作为主要理由，指出在国防方面政府需要在核武器项目上花费更多，这些项目将使他们的组织、商业或者选民获益。

新时期的中美战略竞争尚未重演冷战时期两极对立助长核武器过度发展的一幕；然而，有理由认为这样的乐观局面可能不会持续太久。

在冷战时期，两极对立助长了核武器的过度发展，新时期的中美战略竞争尚未重演这一幕。然而不幸的是，有理由认为这样的乐观局面可能不会持续太久。首先，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多年里，美国持续关注正在衰落的俄罗斯所保留的超级大国量级的核武器所造成的潜在威胁，而不是中国规模较小的核武库造成的威胁。但是近期美国越来越关注中国作为崛起中的超级大国的核武器现代化。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1987年与苏联缔结的《中导条约》，不仅指控俄罗斯违

反条约，还强调该条约限制了美国应对中国解放军在亚洲迅速发展中程武器的能力，却对中国没有任何限制。此外，特朗普政府不准备续签2021年2月即将到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 简称 New START)，称将中国纳入战略武器控制体系的时机已经成熟。尽管中国拒绝上述提议，美国的立场表明，中国的核能力已经成为美国衡量自身核武库是否充沛的重要考量之一。

其次，尽管中美间竞争日益加剧，迄今为止，核军备竞赛仍保持低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一直坚持相对简单的威慑战略，即仅部署规模不大的核武库，以最小当量开展报复性打击。可以说这一战略是对核武器革命持久战略重要性的明智反应。但是中国有限的核武器部署也反映出其面临的资源限制。在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头40年间，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领导下，军事现代化服从于其他国内政治、经济的优先事项。近期，中国开始将全面军事现代化提升到更为重要的位置。然而，为应对核武器可能无法发挥作用的突发事件，中国政府迫切地投

¹ William Burr,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the ‘Horror Strategy,’ and the Search for Limited Nuclear Options, 1969-1972: Prelude to the Schlesinger Doctrin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7, No. 3, 2005, pp. 34-78.

人发展野心勃勃且造价昂贵的常规力量升级项目（尤其是海军力量）。但是如果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允许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军备升级中，中国还会保持核克制吗？随着与美国的竞争不断加深，中国的制度利益可能倾向于拥有更大的武器库，中国还会保持克制吗？从冷战的经验来看，中国可能会加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将国家财力浪费在部署远超出威慑合理要求的核武器系统。

五、网络：令人担忧的新问题

最后一个影响中美竞争关系的关键因素，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中美两国是新型网络技术的世界领导者，这些技术具有军事意义，且影响尚不明确。在网络领域的讨论中，对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战略关切常常被放在一起讨论，这些关切在冷战的最后十年开始受到关注。¹但是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它们的实际意义已然显现。

两个主要问题开始浮现。首先，军事效能现在依赖于与技术相结合的网络，这些技术往往比其所指挥和控制的武器更为脆弱。因而，在危机期间或军事对峙的早期阶段，在对方可能破坏自身军事协调和威胁评估的能力之前，中美两国都有先发制人的动机。在战略分析的专业语境中，这些尖端技术对于军事行动的重要性增加了国家采取先发制人措施的压力，而不是倾向于危机管理和冲突降级的耐心和克制。上述不稳定态势将会由于这一原因而进一步加剧——大国冲突中的网络攻击会导致“跨域”升级的新风险，减损各方对核威慑效力的信心。

其次，对网络战的考虑似乎可能会加大中美在军备竞赛中部署更多常规武器的动机。为了应对网络战的风险，两国都有增强军事实力的动机，以防范脆弱网络可能出现灾难性故障的风险，并为可能出现的“盲斗”（fight blind）做好准备。此外，由于大国冲突中网络武器的效能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检验，为了直截了当地使用动态武力，两国都有配置更大规模常规武库的动机。在先发制人使用动态武力的情况下，常规武器在技术层面相对要求不那么精细，至少没那么小众，是平衡网络攻击的可行选择。

结 论

上述导致冷战时期美苏对峙的三个原因——无政府秩序下两极国际体系中拥

¹ 关于早期的研究，参见 Bruce G. Blair, *Strategic Command and Control: Redefining the Nuclear Threa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5; Eliot A. Cohen, “A Revolution in Warfare,” *Foreign Affairs*, Vol.75, No.2, 1996, pp. 37-54。

核国的互动——正在塑造中美竞争日益加剧的新时代。因此，有理由预计近期中美关系急剧下滑的趋势将继续下去。但这些因素并不意味着中美未来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相反地，就回答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其著作的标题中提出的问题——以“修昔底德陷阱”来比喻有关大国权力转移的洞见而言，中美可能并不会“注定一战”。¹ 冷战经验反映的利好面在于：受困于军备竞赛的超级拥核国，对于将敌意升级为战争的可怕后果有清晰认识。对迅速出现且显而易见的灾难性后果的明确与不可避免的恐惧，为当代的超级大国提供了强烈的动机，促使它们认清现实：尽管相互对立，学习以对手的身份生活，最为符合它们的利益。²

然而，核革命令人放心的一面并不能消弭其他两个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因素：其一从地缘上看，中美竞争的主要场域在海洋上；其二是影响力尚不明确的尖端网络技术，与超级大国令人震撼的军备紧密交织在一起。更广泛地说，对于近期不断恶化的中美关系能够出现逆转，本文没有太多乐观的理由，更不用说回到之前接触政策下的有限竞争和强劲合作的局面了。相反，中美关系的未来可能注定会像今天一样令人担忧。笔者在文中提出的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以及笔者尚未提及的国内政治考虑）的持久性表明，³ 这种令人担忧的角逐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在拥核时代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中美竞争很可能会保持和平。然而，这种和平但持久的竞争时代将是可悲的。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似乎注定要共存在一个不那么繁荣的世界，随着两个超级大国竞争不断加深，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更加难以应对。

总之，中美关系的新时代不会是20世纪冷战的复制。全球意识形态竞争、经济完全割裂以及代理人战争中的军备竞赛是美苏关系的代名词，它们尚未成

1 Graham T.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2 正如约翰·路易斯·加迪斯所论述的，冷战更适合被称作长和平，值得一提的是没有爆发大国战争，参见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0, No. 4, 1986, pp. 99-142。参见 Yan Xuetong, “The Age of Uneasy Peace: Chinese Power in a Divided World,”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1, 2019, p. 40。

3 本文中尚未提及的很多关键的国内政治影响因素，为竞争仍将持续的判断提供了更多佐证。这些国内因素包括：美国选民的动态鼓励候选人争相对中国表示强硬；对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质疑，导致更强硬的国家主义冲动，势必要在与美国的竞争中站稳脚跟；还一直存在争议的人权问题，最近又开始提及，反映出美国与中国在政治、文化、历史方面的差异。这也是可以从冷战经验中吸取的教训，美苏两国的关系经历了剑拔弩张的对峙时期，也经历了相对缓和的时期，部分是因为两国的主要领导人选择如何应对争霸。见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Daniel L. Byman and Kenneth M. Pollack, “Let Us Now Praise Great Men: Bringing the Statesman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2001, pp. 107-146;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Fareed Zakaria, “The New China Scare: Why America Shouldn’t Panic About Its Latest Challenger,” *Foreign Affairs*, Vol. 99, No.1, 2020, pp. 52-69。

为、也永远不会成为中美关系的代名词。尽管如此，国际和国内影响因素正在塑造21世纪的中美关系，虽然与众不同，但不幸的是，这种关系与长达数十年的美苏对抗有着相似之处，同时又带来了一些新的、令人不安的风险。

（李冰洁译；曾楚媛校）